

論 1920–30 年代聖詩中譯的實踐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into
Chinese in the 1920-30's

柳博贊、祝帥

LIU Boyun, ZHU Shuai

作者簡介

柳博贊，北京語言大學講師；祝帥，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Lectur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ZHU Shuai, Associate Researcher,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Email: ruether@126.com; zhushuai@pku.edu.c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1920's-30's, exploring the texts, methodology,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the etho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the primary venue for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with Liu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translators, but several denomin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project. Translations, original works and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periodicals like *Zi Jing* (Amethyst) or *Sheng shi yu sheng yue* (Hymns and Sacred Music) reveal the scope of the endeavor to indigenize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concern for universalizing Christianity, and a sympathy towards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se text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s concern not only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hymnal and the ethos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translators' theological views.

Keywords: Chinese Church, Yenching University, hymnal, translation

劉廷芳譯《大地風光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①的時候，將原詩中的“Linking sense to sound and sight”譯為“聲色由空轉化真”。原文的意思是將聲音、視野與感官聯繫起來，即在主觀和客觀之間搭起橋樑，而劉廷芳的本土化的改譯也與此相似：翻譯的工作正是在原語言和本土語言，以及原詩所根植的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搭起橋樑。而聖詩是基督教敬拜的一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集體崇拜儀式到個人靈修活動都是如此，聖詩的傳譯，也構成中國基督教 20 世紀“本色神學”探索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對於同一種宗教——基督宗教——在不同國家和文化之中的表達而言，聖詩翻譯的工作尤為重要。本文從 20 世紀 20 與 30 年代中國基督教會內部對英文讚美詩的翻譯出發，來探討該翻譯工作的過程中出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譯作、方法論、神學視角以及反映出來的時代背景特點。

一、作為“聖工”的聖詩中譯

相對於肇始自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的《聖經》中譯，中國基督教（新教，下同）對於聖詩在宗教傳播中的深入研究與大規模的翻譯實踐要晚得多。1919 年中文和合本《聖經》出版之後，有感於中國基督教讚美詩的缺席，在 20 世紀 30 年代，作為中國基督教“本色之探”的一個組成部分，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師生開始在聖詩的中文譯本和原創聖詩方面進行探索。以《紫晶》、《真理與生命》（後者包括《聖歌與聖樂——討論教會生聖歌與音樂的刊物》）等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70 頁。收入《新編讚美詩》第 26 首，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2003 年。[LEW Timothy Ting-fang, ed., *Zi jing*, no. 2(1934): 270. Collected in the *New Hymnal*, no. 26 (Shanghai: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2003).]

雜誌為障地，劉廷芳、楊蔭瀏等或譯配，或原創，或為聖詩的翻譯、創作和配樂原則做出了深刻的闡釋。這些是中國本土基督教會對聖詩中國化的一次寶貴的嘗試，為日後的中文基督教聖詩奠定了基礎，也推動了中國基督教會本身的本色化進程。

《紫晶》雜誌是劉廷芳於 1930 年在北平創立的一份基督教靈修刊物，1938 年停刊。劉廷芳是《紫晶》雜誌的編輯主幹，即總編。楊蔭瀏是編輯襄理，即總編助理。撰述者還有許地山、李榮芳和謝冰心（英文署名 Wu Hsieh Wan-yin，即吳謝婉瑩）等，這些作者都是燕京大學的基督徒師生，其中劉廷芳撰寫的文章佔據了主要的篇幅。^①《紫晶》對聖詩和聖樂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比如“六公會聯合聖歌委員會音調比賽”活動就是由《紫晶》雜誌宣布了比賽的結果，分為“新調創作比賽”和“國有舊調改協比賽”，並給出了第一名酬洋二十元、第二名酬洋十元、第三名酬洋三元的獎勵。^②

《紫晶》雜誌的編輯通訊處就是劉廷芳的住所。^③當時燕南園的燕京大學教師住宅編號是從 51 到 66 號，而排在最前的燕南園 51 號正是劉廷芳所住的小樓，而排在編號最後面的燕南園 66 號曾經是冰心和吳文藻的住處，冰心就是在這裡為聖詩的翻譯做出了貢獻。1934 年，她以優美的文筆翻譯了《歡樂讚揚歌》（*The Strain Upraise of Joy and Praise*），刊登在《紫晶》雜誌上。^④

中華基督教會海淀堂（今北京基督教海淀堂）是燕京大學師生在基督教本色化道路上的另一個重要成果，而海淀堂的落成也與《紫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紫晶》刊登了劉廷芳於 1933 年 9

^① 參見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01 頁。[XU Yihua, *Jiao hui da xue yu shen xue jiao yu*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99), 101.]

^②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287 頁。

^③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 年第一期，第 120 頁。

^④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66-267 頁。

月 30 日寫就的《北平海淀中華基督教會建築新堂落成報告書敘言》，其中簡單介紹了海淀堂的建堂歷史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在他看來，海淀堂的種子乃是“庚子之難”（義和團運動）殉難之信徒的鮮血。從一開始的時候，海淀堂就與中國本土信徒的信仰和實踐緊緊聯繫在一起。海淀堂的創立之人雖是外國人，但中國信徒的組織和奉獻使海淀教會乃至中國教會得以存在並發展。這幾個條件缺一不可。正因為如此，每一位中國信徒也應當盡自己所能佈道和發展教會。^①在這篇《敘言》之中，劉廷芳鄭重地做出了中國教會的本色宣言：“中國的教會，是中國人的教會。”^②以《紫晶》雜誌和海淀堂為平台，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師生在進行本色化神學理論研究的同時，獲得了重要的靈修實踐陣地。

《真理與生命》是時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代理院長的徐寶謙主編的另一本基督教刊物。徐寶謙是燕京大學基督徒團契的創始人之一，曾經就讀於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新儒家思想的倫理實在論》（*Ethical Realism in Neo-Confucian Thought*），討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之溝通問題，而他主編的《真理與生命》，日後也為基督教聖詩中譯的理論探討提供了重要的平台。^③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年第二期，第356-357頁。

^② 同上，第357頁。

^③ 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第156頁。[ZUO Furong, *She hui fu yin, she hui fu wu yu she hui gai zao: Beijing jidujiao qing nian hui li shi yanjiu*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5), 156.] 徐寶謙的博士論文的中文譯名從雷立柏譯法，參見雷立柏：《論基督之大與小：1900-1950年華人知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168頁。[Leo Leeb, *Lun Jidu zhi dayu xiao: 1900-1950 nian hua ren zhi shi fen zi yan zhong de jiduji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168.]

在《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中，時任六公會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①主席、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牧師劉廷芳，發表了《過來人言》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十年前（1924年）自己在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時候，就非常重視中國聖歌的編寫，並到受公理會邀請加入六公會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一直沒有停止過促進這些工作進行。因此，他決定和楊蔭瀏一道編輯出版《聖歌與聖樂》雜誌，作為《真理與生命》的增刊，來收集、譯配聖歌，對聖詩的翻譯做出研究，並加以記錄。^②

教會音樂學者、作曲家楊蔭瀏的《聖歌探討之初步》是《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的增刊《聖歌與聖樂》中的一篇重要理論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聖歌的選擇、翻譯、文字的風格、音樂的種類等等做出了綜合性的描述。他提到，在1929年，中華聖公會已經指派了讚美詩委員會重編聖公會的讚美詩，同年還曾經徵求用中文創造的詩歌。到了1931年，聖公會《頌主詩集》的稿本就編成了，之後又根據會眾的批評建議做出了修正。同年，六公會聯合聖歌委員會成立，編輯聯合聖歌集。楊蔭瀏感嘆說，在會員之中，“有的對於聖歌的歷史背景，有特殊的認識；有的對於聖樂的沿革發展，有清楚的觀察；有的對於神學研究，有深刻的參透；有的對於中文詩詞，有高深的修養；有的對於現代文學，有相當的地位……”^③而他對這些能力的肯定也體現了他對聖歌翻譯的性質和要求的看法，即傳統文學功底要紮實，文筆要出色，而神學背景也要過硬。這些他所看重的方面體現在了他的翻譯之中。

^① 其中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中華聖公會（Chung Hwa Sheng Kung Hwei）、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華北公理會（North China Kung Li Hui）、華東浸禮會（East China Baptist Convention）和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② 劉廷芳、楊蔭瀏主編：《聖歌與聖樂》，載《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2頁。[LEW Timothy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eds., “Sheng ge yu sheng yue,” *Zhen li yu sheng ming*, no. 1 (1934): 32.]

^③ 同上，第34頁。

1922年5月2日至12日，中華續行委辦會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舉行，基督教全國性組織——中國基督教協進會宣告成立，會址設在上海，此前的“續行委辦會”與此同時壽終正寢。新成立的中國基督教協進會內各差會、各宗派一致達成共識，要將現行的所有聖詩編纂到一起，形成一本可以通用的詩集。當時，共有六個宗派參與了編寫工作，另外還有幾個宗派參與了修訂工作，而他們成果就是《普天頌讚》。1936年，《普天頌讚》在上海由廣學會出版。與之同時出版的還有中國基督教敬拜儀式手冊《普天崇拜》。這是繼中文和合本《聖經》出版之後，中國基督教會協作同工的一個重要出版成果，它們的出版，也意味著中國基督教傳教運動從分散的各自為政的狀態開始走向聯合，從自發的狀態走向自覺，並有意識地在其中突出了本土化的成果以及本土基督教學者的貢獻。

事實上，在《普天頌讚》出版之前，在中國的各差會就已經有了聖詩專業機構的設立。此前，由中國各省基督教各差會中中西基督教領袖構成的中華續行委辦會，就曾經設立“聖詩學”特委辦。楊蔭瀏在《聖歌探討之初步》中也提到，早在1929年，中華聖公會就已經設立了“聖詩委員會”來重編聖公會中所使用的聖歌集。^①1931年，中華聖公會讚美詩委員會徵集了一些曲調，六公會聯合聖歌委員會也創製了一些曲調，而後來六公會又聯合開展了有廣泛群眾參與的聖詩曲調徵集。^②

在聖詩的翻譯、創作和配樂工作中，身為六公會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總幹事的楊蔭瀏以及身為主席的劉廷芳的工作，在《普天頌讚》收入的所有聖詩之中所佔的比重最大。據研究者統計，《普天頌讚》一共收錄了548首曲調，“其中楊蔭瀏與劉廷芳合作翻譯、

^① 劉廷芳、楊蔭瀏主編：《聖歌與聖樂》，載《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4頁。

^②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287頁。

修訂 210 首，而這 210 首中，由楊先生自己單獨翻譯的竟達 150 首之多。另外，他還獨自作曲 15 首，作詞 7 首，並撰寫了《普天頌讚》數字譜即簡譜‘序’。”^①事實上，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新編讚美詩》出版之前，《普天頌讚》可以說一直是中國大陸地區基督教各教派最為普遍流傳的聖詩版本，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基督教的“聯合聚會”後，《普天頌讚》更是大顯身手，成為除少數堅持使用自編自創的本土詩歌選本的教派外，大部分基督徒廣泛使用和喜愛的一個聖詩選本。而直到今天，在我國香港、台灣地區，《普天頌讚》也是最受歡迎的基督教詩歌選本之一，歷經多次修訂，發行量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天頌讚》出版之前，劉廷芳、楊蔭瀏的許多作品就已經通過《紫晶》雜誌先行發表出來，而《真理與生命》雜誌的增刊《聖歌與聖樂》也是與《普天頌讚》的編撰聯繫在一起的。楊蔭瀏在聖詩的遴選、翻譯、配樂等問題上的研究有很多就刊登在《聖歌與聖樂》上，使之成為了中國聖詩成型的理論指導，也記錄了聖詩翻譯的艱辛歷程；而《紫晶》雜誌也大量登載聖詩的翻譯和創作，為後人留下了這些聖詩翻譯原始版本的重要資料。

二、本土化的遴選與意譯

可以看到，刊登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兩份雜誌上的聖詩，在文筆方面有幾個特點：（一）不一定所有的譯文都完全忠實於原文，意譯大於直譯；（二）原創的聖詩與外國聖詩本土化翻譯並重；（三）本土化色彩和個人神學主張明顯；（四）受眾大多是年輕人，體現出譯者鮮明的性格和神學主張。

^① 翟風儉：《楊蔭瀏：中國宗教音樂研究的拓荒者》，刊於《中國宗教》，2009 年第 2 期，第 24 頁。[ZHAI Fengjian, "YANG Yinliu: Zhongguo zong jiao yin yue yan yan de tuo huang zhe," *China Religion*, no. 2 (2009): 24.]

我們可以在很多中文聖歌中看到，其譯文與原文字詞有很大的差異。楊蔭瀏和劉廷芳翻譯聖詩的時候，他們常常並非完全直譯，而是尋求在自己看來最為貼切的詞語，包括對聖詩题目的翻譯。我們從中譯本的題目往往無法逆推而得知英文原詩的題目是什麼。內容也是做了相同的處理。略舉幾例：

《因恩賞賜歌》(*Lord, in Thy Name Thy Servants Plead*)^①原名意思是“主啊，你的僕人奉你的名祈求”，而楊蔭瀏在中文譯本中將地上祈求者的視角轉移到天上賜恩者的視角，從祈求之時的時空狀態轉移到得到恩賜之時的時空狀態。實際上在本詩之中，人提出的祈求和上帝的恩賜是交互進行的，人已經在認識到萬物是上帝的恩賜的前提下提出新的祈求，又在祈求之中看到未來上帝做出的回應，這種祈-應-祈-應的順序一直向上延伸到新天新地的應許，暗含著對上帝最終信實的恩賜的信心。因此，將“主啊，你的僕人奉你的名祈求”譯為《因恩賞賜歌》也不失為一種不離題且恰當的譯法。

一般來說，在不嚴格的轉譯的時候，意義的傳達還是比較有效的。因為譯者要麼將原文的精義保存下來，要麼根據原文的大體意旨加以重新創作。但是，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一些稍有遺憾的譯筆。比如劉廷芳所譯的《簇新民族歌》(*These Things Shall Be*)，^②第二段將 *man's Lordship* 譯為“人權”，但該詞和 *human rights* 殊無關係，指的是人類對自然界所擁有的治理權 (*stewardship*)，這應當算是誤譯。如果我們純看“人權”一詞，料譯者思想甚為進步，對政治用語比較敏感，但接下去第三段的 *fraternity* (博愛) 又沒有翻譯出來，而是用非常詩意但關係不大的“熱血滿腔”代替。

實際上，當時的譯者和編者這些聖詩的翻譯被分為兩類，我們從譯者或作者名字的後面一個字可以看出來。凡是比較忠實於原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86頁。

^② 同上，第120頁。

文的，就被稱為“某某譯”，而自由發揮的程度比較高的就被稱為“某某述”。其中也有原創的聖詩，比如《紫晶》1935年第一期刊登的許地山的《神佑中華歌》和朱葆元《中華教會自立歌》。這些原創的聖詩極具民族色彩乃至民族主義色彩。

許地山的《神佑中華歌》^①一開頭就聲稱：“神明選擇賜予，一片荊原棘地，我祖開闢”，彷彿中華民族也是上帝之選民，以“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進入並經營這一片應許之地。後面更是自豪地指出：“舊邦文化雖有，許多消滅已久，惟我獨留。”許地山在這首聖詩中並未體現出對靈性提升的渴求，只是禱告上帝使中國的民眾能夠在生活和道德智慧上長進，這是很切實此世化的表達。

《中華教會自立歌》^②也是相仿。在這首聖詩的第三段，朱葆元用了較為古雅的辭藻寫道：“文明日進，聖教大行……大造恩周，用康保民”，很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宗周德喪，青駕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之以時代的變革大背景來烘托基督教傳播的特點。而其中“用康保民”之語更是直接引用《周書·康誥》，“別求闡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這使民國時期的本土基督教立即有了“為往聖繼絕學”的身分，躋身於聖賢品之列。

至於聖詩的閱讀者和詠唱者，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有比較年輕化的特點。《紫晶》雜誌的創辦者、編輯和主要撰稿人都是燕京大學的師生，這決定了其中刊登的讚美詩的受眾以燕大的青年教師和學生為主要假想對象。我們在這些聖詩之中發現，譯者或原創者非常強調“少年”應當如何去做，來實踐自己的信仰。比如，在劉廷芳述，杜毅著的《得勝歌》（*Fling out the Banner*）^③譯文中，我們與原詩做出對比之後就可以意識到，其中的第五段純屬自創而非譯配，而其中就有對“眾少年”的呼召。茲將這段聖詩歌詞列於下：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115頁。

^② 同上，第115-116頁。

^③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年第二期，第278頁。

展開得勝旗，眾少年！
來主麾下征服群怨，
努力猛進，希望在前，
光明天國實現人間。

《得勝歌》就是對原文做出重大改編的例子。原文共六段，譯文僅五段，而且大多不對應原文，屬於自創，比如“乘長風”等詞句，非常具有中國傳統文學的風格，在英文中無法找到相應的表達。

同樣，楊振章（楊嘉仁）創作的《四時近主歌》^①第一段也有“凡我青年，尋求宜早……壯歲韶華，白駒易逝”的話。

還有，劉廷芳翻譯的《青年向上歌》(*I Would be True*)^②也莫名添加了“青年”一詞，為原文所未有。而其中“我施與，並不記所施何物”(I would be giving, and forget the gift)被翻譯成很中國式的“我要施贈，義重財輕。”當然，這段歌詞的經文依據是《馬太福音》太 6:3“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和《使徒行傳》20:35“施比受更為有福。”但是，劉廷芳以非常具有中國傳統文學特色的“義重財輕”對《新約》的倫理要求做出了比較準確的概括。在翻譯的時候，劉廷芳也做出了取捨，《青年向上歌》的原文有六段。而他只翻譯了其中的兩段。

沈子高所述的《耶穌呼召歌》(*Jesus Calls Us o'er the Tumult*)^③的第四段：“負主十架，從主奔跑，一心愛主，愛同胞”也是原文沒有，譯者自創的。非常具有“愛國”(patriotic)色彩。沈子高也是六公會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普天頌讚》中有 13 首聖詩是他譯配的。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年第二期，第269頁。

② 同上，第281頁。

③ 同上，第279頁。

相對於原文而言,《愛人歌》(*O Brother Man, Fold to Thy Heart*)^①翻譯的內容基本不錯,只是第一段“每個笑容就是一首聖詩,每件善行就是一次禱告”被譯為“祈禱頌揚,莫離和顏善行”,不知道是理解錯誤,還是為了譯配的緣故做出了意譯。而第四段“狂亂的戰樂”被翻譯為很中國的“戰樂悲筵”,而末尾的“種下和平之樹”被翻譯為“盛放和平之花”,可能是因為要押韻的緣故。

劉廷芳所譯的《大地風光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②,加上了“祖宗遺澤”和第五段“中華民族神所眷,五千年來受惠深,地上香花天上蕊,人尊美德帝垂恩”,為原文所未有。這裡出現了過分的民族主義,似乎有損於基督教“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的大公性和人人平等的原則(參《聖經》林前 12: 13)。也可能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日後中國基督教兩會出版的《新編讚美詩》中,這一段並未被收錄。

此外,在譯者挑選聖詩來翻譯的時候,常常有意凸顯一些具有民族性特點的聖詩,比如《聖巴特里克鎧甲歌》(*I Bind unto Myself Today*)^③。據說這首聖詩的原詞是愛爾蘭護國聖人巴特里克(St. Patrick)所做,而著名愛爾蘭讚美詩作家亞歷山大夫人(Cecil Frances Alexander)改編之,加以古愛爾蘭曲調,就成為了現在的版本。

與此相似,《紫晶》雜誌 1936 年第一期中也錄入了楊蔭瀏譯的《馬拉巴禮拜歌》(*Strengthen for Service, Lord, the Hands, Liturgy of Malabar*)^④。這首聖詩是基於五世紀印度南部馬拉巴禮儀的禮拜歌而創作的。該教會從屬於東方教會(聶斯托利派),崇拜語言使用敘利亞文。亨弗雷斯(C. W. Humphreys)和迪爾默(Percy Dearmer)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80 頁。

② 同上,第 270 頁。

③ 同上,第 285 頁。

④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6 年第一期,第 97 頁。[LEW Timothy Ting-fang, ed., *Zi jing*, no. 1 (1934): 97.]

將其從敘利亞文翻譯為英文，收錄在迪爾默參與編寫的《英文讚美詩》(*The English Hymnal*) 1906 年第一版之中。^①

選擇這首聖詩有很重大的意義。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即七世紀的東方教會(聶斯托利派)，和馬拉巴教會同出一源。而《馬拉巴禮拜歌》經由敘利亞文-英文-中文的轉譯，加上本自德國的配樂(約翰·S·巴赫改編的 *Ach Gott und Herr*)，非常具有普世主義色彩，超越了民族和教派。當時的英國是處於鼎盛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後，愛德華時期之初，仍然有萬邦來朝的氣象，所以錄入印度、愛爾蘭風格的聖詩也很正常。但楊蔭瀏翻譯《馬拉巴禮拜歌》、《聖巴特里克鎧甲歌》並沒有大英帝國式海內歸一的抱負，反而可能更加認同印度和愛爾蘭這些受到其侵略和壓制的國家，與其建立本土化民族教會的初衷一致。

三、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傾向

劉廷芳和楊蔭瀏對聖詩的遴選以及翻譯的時候，對聖詩內容的增刪也體現了他們在神學立場方面的傾向，比如普世化和本色化並重、強調社會福音(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為此不惜進行創造性的意譯甚至改譯。如《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69 頁，就說明了《傳布救恩歌》“本譯詞因欲避免格林蘭、印度、非洲、錫蘭等普通人不能知道的專門名詞，不是直譯”，“第一節完全重寫，第二節首句也略有變更”。

《小小水滴歌》(*Little Drops of Water*) 是楊蔭瀏和劉廷芳 1934 年譯出，刊登在《紫晶》1935 年第一期上的聖詩。^②至於《小小水滴歌》的第四段和第五段，和原文差異就比較大了，而這種有意而為的差異是和譯者的普世化和本色化傾向分不開的。原文的字面意

^① Percy Dearmer and Ralph Vaughan Williams, eds., *The English Hymn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6), 463.

^②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7 頁。

思大概是這樣的：“年輕的手種下的憐憫種子雖小，卻成長起來遠至異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榮耀永屬美好慈愛的至高上帝，直到萬世。”但譯者將第四段“成長起來遠至異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轉譯為“能夠開出香花，施福千萬眾”，而“異教徒的土地”字樣被全部刪除。原文是體現了非常明顯的宣教情懷。中文譯者並非反對宣教，只是不巧正值生活在“異教徒的土地”上，因此將該敏感且不利於本土教會發展的詞句撇下不譯。同樣，《得勝歌》第二段的“異教徒的土地”也被轉譯為“萬民”。與此相似，《傳佈救恩歌》（*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①中“盲目的異教徒”也被轉譯為“盲目的人類”。

然而，除了普世化和本土化並重的傾向之外，我們更在聖詩的譯創上看出了積極的社會福音立場。《小小水滴歌》第五段的譯文是“小小和愛事情，小小溫柔話；能使世間改善，變成天父家。”這與原文簡直沒有任何關係了。由此，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譯者的出發點是什麼。除了緊扣對關鍵詞“小小”的強調之外，該譯文還體現了“人間天國”的思想，號召要以善行在此世之中建立新的世界。而《得勝歌》也有“光明天國實現人間”的自創詞，為原文所未有。

其他一些聖詩譯文中也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傾向。譯者一方面是有意選取了這些聖詩，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深化了原有的進步色彩。以刊登在《紫晶》雜誌1935年第一期上的《神聖同志歌》（*Jesus, Thou Divine Companion*）為例，^②原文中的companion意思是同伴，但劉廷芳和楊蔭瀏翻譯為革命色彩濃厚的“同志”。該詞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時期便廣泛使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仿效前蘇聯，更是使“同志”成為了一般民眾最為常用的稱謂。而第一段的最後一行“你教導我們勞動是好的”，被譯為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年第一期，第268頁。

^② 同上，第84頁。

“一切勞動都神聖”，將“勞動”提升了一個檔次，成了超越世間俗務的行為，本身是神聖的，也使勞動者自身得以聖化。

刊登在《神聖同志歌》之後的就是同樣具有革命精神的《勞工歌》(*When Through the Whirl of Wheels*)。^①原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傑弗里·肯尼迪 (Geoffrey Anketell Studdert Kennedy) 於 1921 年為工業基督徒團契 (ICF, Industrial Christian Fellowship) 所寫，有很鮮明的“左翼”特點。在這首聖詩中，肯尼迪描述了那個時代工業的發展、產業工人群體的壯大及其勞苦。在他的眼中，主耶穌基督以自己的受苦與受苦的眾人同在，並且以自己的能力使他們獲得能力和希望，在日常的工作中堅忍不拔，為他做工，並滿懷信心等候他的復臨。肯尼迪也身體力行，在一戰中作為隨軍牧師為將士效力，身帶香煙以慰軍，被暱稱為“捲煙威利” (“Woodbine Willy”)。^②大文豪詹姆斯·喬伊斯也曾經在《芬尼根守靈夜》裡提到了他。^③肯尼迪逝世於 1931 年，有完整詞曲的《勞工歌》於 1931 年出版，而 1933 年劉廷芳就選擇了這首聖詩來譯為中文，非常緊隨時代，也表現出他對社會進步的關懷。在譯文中，劉廷芳還補充了一些原文沒有的詞，比如第二段第一句的“環球工廠”一戰之後，世界範圍內工業發展迅速，中國也不例外。劉廷芳在翻譯《勞工歌》的時候，必然想到廠房林立的現狀，才加進了這一句個人的闡釋。

此外，劉廷芳還翻譯了《勞動同志歌》(*My Master Was a Worker*)。^④這首聖詩的原作者塔蘭特 (William George Tarrant) 是一位論教派的神職人員，本為鐵匠，原詩中確實用了 comrade 一詞，劉廷芳將其譯為“同志”，這無疑是一種正確的直譯。只是需要看

^①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5 頁。

^② 關於《勞工歌》原文背景，參見 Raymond F. Glover,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Essays on Church Music*, vol. 1 (New York, NY: The Church Hymnal Corporation, 1990), 498.

^③ Roland McHugh,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3rd ed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1.

^④ 劉廷芳主編：《紫晶》，1935 年第一期，第 83 頁。

到，劉廷芳之選擇翻譯這一類宣揚社會主義的詩歌，必然也是出於社會福音的重視。

我們已經看到，在劉廷芳對於聖詩的選擇和翻譯中，頗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傾向。這當然是與當時的社會思潮分不開的。從 19 世紀後半期開始，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英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教會中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思想家，包括倫敦國王學院英國史和文學教授茅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劍橋大學現代史皇家教授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等等，他們以《聖經》中的“左翼”教導為論據，推動基督教對社會進步發展方面的作用。而彼時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在劉廷芳創作翻譯這些聖詩的 20 世紀 20-30 年代，也已經開始大量通過譯文或著作，在中國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中間廣為傳播。

事實上，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思想在理論上有先天的契合。基督教在誕生伊始，就是一種消弭社會階層隔閡、性別對立，倡導勞有所得的平民宗教，在此不妨略舉幾例《聖經》中被視為具有普世關懷性質的經文。如《使徒行傳》2:44：“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使徒行傳》4:32：“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帖撒羅尼迦後書》3:10：“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雅各書》5:1：“噫，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雅各書》5:4：“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等等，這在當時等級劃分比較嚴格的社會中是有著積極的進色彩的。正如耶魯大學教授米克斯（Wayne A. Meeks）所說，在《新約》中，使徒保羅逆轉了羅馬世界對社會階層的固有看法，提升了

平民的地位，認為上帝所揀選的正是這些人。而他的書信的受眾則範圍很廣，包括了“各樣階層、財富、出身、種族的男人和女人”。^①

事實上，與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同一時期，很多基督教會之外的思想家也指出了早期基督教的“無產階級特性”。恩格斯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中這樣說道：

我們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之中可以看到，它與現代工人運動之間具有值得注意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將二者聯繫在一起。在起初的時候，作為工人運動的的基督教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首先是奴隸、解放奴隸、被剝奪權利的人、被羅馬征服和遣散的民族的宗教。^②

恩格斯在對《啟示錄》的評註中，引用了勒南（Ernest Renan）的一句話：“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徒群體是什麼樣子的，那麼就不要將他們與今天的教區會眾相比；他們更像是第一國際的地方分部。”^③他對勒南的觀點持肯定態度。接下去，他繼續評論道：“基督教和任何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一樣，都是群眾所創立的。”^④而全球工業化生產背景之下的這種左翼思潮也影響到了聖詩的創作和選編。1906年第一版《英文讚美詩》的主要編者迪爾默就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迪爾默選取了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聖詩進行翻

^① Wayne A. Meeks,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Morality: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2.

^② 恩格斯：《恩格斯論宗教》，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頁。[Friedrich Engels, *En Gesi lun zong jiao*, trans.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19.] 本文基於英語和法語譯本，對引文的個別詞句做出了修改，下文亦同。

^③ 恩格斯：《恩格斯論宗教》，第11頁。

^④ 同上，第12頁。

譯和輯錄，而這些聖詩及其“左翼”特點也經由劉廷芳、楊蔭瀏等人的譯介進入了中文聖詩的視野。

可以說，劉廷芳本人正是持有並強化了這種基督教自身所固有的社會福音的立場。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做出過這樣的敘述，來表明自己對基督教在現世的社會中施行拯救和變革的觀點：

數十年來基督教有好些學者和服務的忠僕，研究聖經，恍然明白基督救世主義不僅是救個人的救主。救世主義並不是專講來世的。他們就著書演說，提倡社會觀的基督教義。起初這種理論頗受一般信徒反對，漸漸明白的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到了今日雖遭受舊派的積極攻擊，愈傳愈盛，教會靜察時勢，潛考聖經，也漸漸的轉向社會觀的教義。^①

在這篇文章中，劉廷芳肯定了華北學生夏令會起草社會信條和進行的計畫的行為。在他看來，每個信徒的信仰都可以落實到對整體社會的變革上，靈修並不僅僅在於個人內在的靈性操練，更是在於產生向外的力量以推動世界的進步。在他看來，“改良社會不能不從改良個人的靈性道德入手，這是基督教千餘年來宣播的宗旨，這宗旨和改良社會的信條是不相矛盾的，實在是互相作用的，我們切莫偏重了一面。”^②而楊蔭瀏更是非常尊重劉廷芳，將其敬稱為“廷芳師”^③。這樣，劉廷芳和楊蔭瀏在聖詩的選擇和翻譯上採用較為進步的立場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是這種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教會內部的傳播的影響及其評價並非本文興趣所在，而似乎劉廷芳、楊蔭瀏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也應該放在一個更大的早期左翼思想在中國知識界的傳播的社會思潮中作如是觀。

^① 見《社論》一文。刊於劉廷芳主編：《生命》第二卷第三冊，1921年10月15日，第1-4頁。[LEW Timothy Ting-fang, ed., *Sheng Ming*, vol. 2, book 3 (1921): 1-4.]

^② 《社論》，刊於劉廷芳主編：《生命》第二卷第三冊，第1-4頁。

^③ 參見《聖歌探討之初步》，刊於劉廷芳、楊蔭瀏主編：《聖歌與聖樂》第一期，載於《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第33頁。

結語

在 20 世紀 20 到 30 年代，繼周作人等知識分子圍繞中文和合本《聖經》翻譯的討論之後，基督教聖詩的中文翻譯及其討論在教會內外蔚然成風。這一翻譯活動以燕京大學為主要的活動地點和思想交匯的處所，受到了數個宗派的聯合工作的推動，而以劉廷芳、楊蔭瀏為代表的聖詩翻譯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在燕京大學的《紫晶》、《聖歌與聖樂》等雜誌上發表了對聖詩翻譯的研究文章，更是刊登了為數甚多的聖詩中文譯本或是原創聖詩，這些作品體現了當時的基督教會對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張，同時也不失對基督教普世主義的關懷。不僅如此，這些中文聖詩中還表現出了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這與聖詩原文的成詩年代乃至中文聖詩的譯創年代和翻譯者本身的神學立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 20 世紀 80 年代之後的中文聖詩譯創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樣看來，儘管早期基督教聖詩翻譯還體現著鮮明的個體神學立場的侷限性及其時代烙印，但他們所開闢的中文聖詩創作領域及其本土化探索的藝術方向，本身就構成 20 世紀中國基督教發展歷程中一個影響深遠但卻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視的側面。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Dearmer, Percy and Ralph Vaughan Williams, eds. *The English Hymn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6.
- Glover, Raymond F.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Essays on Church Music*, vol. 1. New York, NY: The Church Hymnal Corporation, 1990.
- McHugh, Roland. *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3rd ed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eeks, Wayne A.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Morality: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恩格斯：《恩格斯論宗教》，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Engels, Friedrich. *Engesi lun zong jiao*. Translated by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 雷立柏：《論基督之大與小：1900-1950年華人知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Leeb, Leopold. *Christianity in the Ey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00 to 195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 劉廷芳、楊蔭瀏主編：《真理與生命》1934年第一期。[Lew, Timothy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eds. *Zhen li yu sheng ming*, no. 1 (1934).]
- 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XU Yihu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99.]
- 翟風儉：《楊蔭瀏：中國宗教音樂研究的拓荒者》，《中國宗教》2009年第二期，第24頁。[ZHAI Fengjian. "Timothy Ting-fang Lew: APioneer in the Research of Religious Music in China." *China Religion*, no. 2 (2009): 24.]

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ZUO Furong. *She hui fu yin, she hui fu wu yu she hui gai zao: Beijing jidu jiao qing nian hui li shi yan jiu*.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5.]